

中国文化史丛书

通往天国的驿站

——话说寺观

孙京荣



03

-18

沈阳出版社

通往天国的驿站

——中国寺观文化

孙京荣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辽)新登字 034 号

主 编：张岱年

执行主编：朱立元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共 80 册/套)

沈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杭新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74.375 字数:5360 万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印数:00001-10000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441-0714-0/G·279

全套定价:380.00 元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一、痛苦的超越

——中国寺观文化的形成 (1)

(一) 寺观溯源 (1)

(二) 寺观文化形成的诸要素 (3)

二、世俗的殿堂

——寺观建筑 (18)

(一) 寺观的建筑技术 (18)

(二) 寺观的建筑艺术 (21)

(三) 塔幢·危崖·金属建筑 (30)

三、无奈的契合

——寺观组织 (37)

(一) 寺观的组织形态 (38)

(二) 寺观的政治作用 (45)

四、特殊的财阀

——寺观经济 (51)

(一) 寺观的恒产 (52)

(二) 寺观的贸易 (55)

(三) 寺观的捐赈 (57)

五、璀璨的宝珠

——寺观艺术 (61)

(一) 寺观文学 (61)

(二) 寺观书法	(70)
(三) 寺观绘画	(73)
(四) 寺观雕塑	(76)
(五) 寺观技艺	(81)

六、虔诚的膜拜

——寺观节祭	(84)
(一) 寺院节祭	(84)
(二) 宫观节祭	(88)

七、神奇的仙境

——寺观旅游	(92)
(一) 佛教旅游名胜简介	(93)
(二) 道教旅游名胜简介	(97)

一、痛苦的超越

——中国寺观文化的形成

（一）寺观溯源

“寺观”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指佛寺和道观。僧人所居曰寺，道士所居曰观。寺，本指衙署，官舍。《左传·隐公七年》“发币于公卿”唐孔颖达疏：“自汉以来，三公所居谓之府，九卿所居谓之寺。”清代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十一云：“今九卿自大理，太常已下官署皆名曰寺，沿东汉之旧也。”而将佛教的庙宇称为“寺”，相传却是汉明帝时的事。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载：“汉明帝梦金人，而摩腾、竺法始以白马随经入中国，明帝处之鸿胪寺。后造白马寺居之，取鸿胪寺之义。隋曰道场，唐曰寺。本朝则大曰寺，次曰院。”佛教寺庙在印度称“僧伽蓝摩”，也称“僧伽蓝”，略称“僧伽”、“伽蓝”。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就是一部以名刹大寺为主纲，中小佛寺为附目，详细地记述北魏时期洛阳城内和城外佛教寺院的兴废沿革，以及有关的史事、景物、掌

故、传闻的名作。此外，“阿兰若”、“精舍”、“梵刹”、“浮屠”等词，也都在一定时期曾作为寺庙的名称。但由于受汉代官署称名的影响，大部分人把汉传佛教寺庙称为寺，在《洛阳伽蓝记》中也以“寺”的称呼最多。唐太宗时，玄奘取经回国，政府为他特设翻经院于寺中，这样“院”又逐渐成为对汉传佛教寺庙的又一名称。尽管唐宋时期对寺庙的称呼很多，如“禅林”、“宝刹”之类，但“寺院”一直是最为常见的称名。

观，即宫观，原指一般的建筑。宫的最初含义是房屋，观是指可以登临其上四外眺望的建筑。大约在汉武帝时，宫观由一般的建筑变成了祭祀神灵的场所。《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听信方士讹传，为见到神仙，于是令“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先后在长安建蜚廉桂观，在甘泉宫建益延寿观。东汉末年，道教初兴，也把祭祀神灵的场所称为宫或馆。《广弘明集》卷十二唐释明概《决对傅奕废佛僧事并表》就有张陵时“杀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坛，戴以草屋，称二十四治。治馆之兴，始于此也”的记载。两晋时道馆名称较多，有庐、治、靖、馆等，但都比较简陋。至南北朝，道教宫观建筑已具规模，称观的很多，如北周的云台观、通道观、玄都观等。唐宋时期，道馆改称为观，大型的又别称为宫，且规模宏大，华丽壮观。这样，道教的宫观之称，成为他们正式的称名，而沿用至今。

一般说来，庙、寺、观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庙指祖庙，寺是官府，观即台观。后来，庙是一般的庙宇，其中供奉的是“神”；寺是佛教的，其中奉祀的是“佛”；观是道教的，其中供奉的是“仙”。

（二）寺观文化形成的诸要素

寺观文化是一种复合型的文化，作为一种建筑和奉祀场所的寺观只起粘接的媒介作用，它的形成对宗教文化与其信仰社群文化之间关系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寺观本身即是构成寺观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还因为，离开了寺观，宗教文化与其信仰社团文化间的联系就失去了最为直接和集中的过渡桥梁，同时也使宗教中心的形成和寺观文化的建立变得茫渺、无望甚至虚幻。

在寺观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佛教与道教的传播是其根本原因，而寺观的兴建则是其重要的外部条件，此外，文化的渗透与浸润便是促成宗教与建筑携起手来创立寺观文化的中间媒介。

佛教与道教的传播

佛教产生于印度，是由释迦牟尼创立的。在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其后，由于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走上了汉化的道路。隋唐以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融合，演化为中国化的佛教。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只用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神仙方术的思想去理解和接受佛教，将它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东汉时，人们多把释迦牟尼和作为道家创始人的黄帝、老子相提并论，将他们并列作为祠祀崇拜的对象。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贵族，史载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汉桓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他在宫中设华盖以祀黄老、浮屠。东汉末年，

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入和流布，其势力也逐渐有所壮大。桓帝、灵帝时代首次翻译经典，最早提供汉译佛典的是安息的安世高和月支的支娄迦谶，形成安译和支译两大系统。当时的佛教中心是洛阳。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一个纷乱残酷的时代，也是外来佛教逐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时代。这时的洛阳和建业（今江苏南京）分别成为南北佛教传播的两个中心。东晋时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统治者多数提倡外来的佛教以抗儒学，以后赵、前后秦和北凉较盛。南朝各代统治者及一般文人学士也大都崇信佛教，使佛教在中国得到了扩展，并且已经与道教相抗衡。由于这时期佛教的幅射力度和范围都在逐渐地加深和拓宽，所以在流布过程中许多思想和教义都在逐步地发生变化，使佛教逐渐在中国化。隋朝虽然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却奠定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唐代佛教的基础，使佛教在北周武帝实行废佛后又迅速地复兴起来。隋文帝杨坚推行佛教治国方针，炀帝杨广也是一个佛教徒。取代隋朝而建立唐朝的李渊定都长安，充实武力，对内发展文化事业，对外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佛教受到唐代帝室和贵族的普通尊重，十分繁荣。玄奘、义净等从印度传来的新佛教和不空三藏等传来的密教，为原先的佛教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时，莫基于南北朝时期的各个宗派，至唐代也是名徒辈出，如法相宗基、律宗道宣、华严宗法藏、净土教善导、禅宗慧能等。另一方面，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也深深渗透到广大民众之中，俗讲、变文相当流行，这一外来宗教终于达到了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休戚与共的地步，形成中国佛教史上的最高峰，同时也对东亚佛教的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

期，也是佛教的中国化的成熟期。五代时期，变乱相仍，战争频繁，唐代各宗派相继衰落，唯禅宗一系宗风不泯，继续发展。随着贵族的没落，这时文化和宗教的主角也由文人士大夫所取代。宋代虽给佛教以适当保护，但佛教却开始离开了纯一精湛的条理而趋于调和混同，以致逐渐退化。在教内则禅教一致、禅净一致，在教外则儒佛一贯、佛道一贯。宋儒理学无论是排佛还是崇佛，实质上都与禅宗有密切的关系，对佛教影响甚大。同时由于封建势力浸透到了佛教内部，封建宗法制度成为其无法摆脱的束缚而流于世袭，导致佛教的文化学术逐渐消沉。与宋同时，北方的辽、金和西方的西夏，佛教却得到了发展。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位前的天复二年（902），就在潢河之南的龙化州（今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以西）建立了开教寺，至圣宗、兴宗、道宗，佛教发展臻于极盛，其中道宗对佛教的崇拜尤其。金代佛教发展迅速，以致威胁国家统治，出现天会八年（1130）的一度灭佛。西夏自元昊创西夏文字起，陆续将全部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字，延续整个西夏的年代。元代在灭亡了金和西夏，兼并了南宋，统一了西藏地区后，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为了克服以落后文化统治先进文化的先天不足，元代统治者特别需要利用宗教来维护其统治，于是将宗教事务作为政治上的头等大事。终元之世，喇嘛僧人享有特权，而对汉地的佛教控制很严。在元代佛教各派中，依然数禅宗最为繁荣。明清以后的佛教虽在大趋势上是逐渐衰落，但其教义已深入人心，化为血肉，且与道教和民间信仰关系相当和谐，真正渗透到民众生活之中。道光以后，国势衰落，佛教也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衰歇。

道教最初肇始于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传播太平之道，

正式完成于东汉顺帝时沛人张道陵在鹤鸣山创立天师道，即五斗米道，它是在承袭古代的巫术、神仙方术和先秦道家、儒家、墨家、阴阳五行和汉初黄老思想的基础上孕育产生的。汉、魏之际，中国已有丹鼎道士活动于各地，但影响不大。相反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符箓派把与老百姓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禳灾治病作为主要活动，赢得了民众的信任，最终形成为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大道派。随着黄巾起义的被镇压，太平道昙花一现，而五斗米道则在张鲁的领导下，割据汉中。晋时，留在蜀地的五斗米道势力东山再起，形成陈瑞道派。而播迁江南的五斗米道则步入上层，走进许多门阀世族，出现了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著名道士，陆续对道教进行清理整顿。唐代，由于李唐王朝与老子李耳同姓，统治者有意提倡，因此朝野上下崇道成风，各代帝王都倍加崇祀，其中许多人都因服丹中毒而丧失生命。这时的重玄派开始引佛入道，奠定了道教哲学的基本范畴。同时，在这种风气弥漫下，兴建了大量的道观，完整了教派的科律，进一步健全了斋醮仪式，并且开创了宣讲注释道经的形式。宋代是道教发展的又一高潮，这不但表现在宋代各君王尤其是太宗、真宗、徽宗等极端推尊道教，而且还表现在出现了大量的教派，如北方的全真道、太乙教等，南方的南宗、净明宗等，对后来道教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至元代，全真道在北方形成强大的教团势力，“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陌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

破”^①规模颇盛。同时江南的正一、上清、灵宝三大教派也在政府的扶持下，成为南方道教中的主要势力。明初，朱元璋命正一天师掌管天下道教事，正一派地位超过全真道而凌驾其上。全真道士遂隐修云游，先后形成了龙门、随山、南无、华山等门派，而以龙门一派势力最大。正一派虽在明代位处贵盛，但因其教义无甚发展，日渐下降，至清其地位已今非昔比，终不能号令天下各派。全真道虽在清代稍呈中兴气象，有“临济龙门半天下”之说，但也无法抗拒由停滞而趋衰落的大趋势。总的来说，明清时代道教日趋没落，其中原因大概为教派的不再分化，教义的陈陈相因，地位的江河日下，教团的腐化堕落以及人们对于道教的失去信任。至今，道教仍在民间派系众多，具有广泛的影响。

寺院与宫观的兴建

一般认为，中国汉传佛寺的最早建筑是洛阳白马寺。永平十年（67），奉汉明帝之命西行求法的蔡愔、秦景等在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邀其来华，用白马将佛像经卷驮回洛阳。初居鸿胪寺，后以鸿胪非久居之馆，次年明帝诏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建造住所。以僧为西方之客，乃待以宾礼，因此仍名为寺，称白马寺。至桓帝，更于宫中立浮屠祠。汉末，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非官方寺院的兴建一时成风，洛阳有菩萨寺，许昌有许昌寺，而竺融在广陵等地兴修的佛寺阁道可容 3000 余人，且初具后来寺院的格局，足见其规模已有相当程度。三国时，康僧会应孙权请求，取得

^① 元好问：《紫微观记》，《元好问全集》卷第 35，下册 14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舍利，因而孙权在江南首次建造佛寺，号建初寺。西晋时期，据法琳《辩正论》卷3载，东京、西京两地共有寺院180多所，僧尼3700余人，见于现存记载中的就有洛阳白马寺、菩萨寺、石塔寺等10余所。东晋的寺院，随着帝室、朝贵及一般社会名流对佛教的普遍热衷，寺院的兴建更是呈现数量多、规模大的趋势，历史上有名的东林、瓦官、长干等寺大都修于此时。南北朝时期则是中国佛教寺院兴修的第一次高潮。这时佛寺遍布大江南北，规模宏大，数量繁多，富丽堂皇。据法琳《辩正论》卷3和道宣《释迦方志》卷4统计，南朝的佛寺，宋有1913所，僧尼36000人；齐有2015所，僧尼32500人；梁有2846所，僧尼82700人；后梁有108所，僧尼3200人；陈有1232所，僧尼32000人。其中梁武帝萧衍时修造的寺院最多最奢丽。如同泰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1描述它是“接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栖魏水宁”，可见其高大宏伟的状况。中唐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吟唱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情景，生动地说明了南朝寺院的众多盛况。与之同时，北朝寺院的兴建也是盛极一时，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的序中言当时“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栴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并称“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从此可看出，当时寺院的大量修建，既反映着佛教的昌盛繁荣，但也曲折地昭示着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对心理慰藉的渴求。隋朝建立，兴建寺院和普度众僧的现象更为普遍，据道宣《释迦方志》载，

有隋一代共立寺 3985 所，僧尼 23 万多人。唐代寺院之数依然庞大。据统计，高宗时有寺 4000 所，僧尼 6 万人；玄宗时有寺 5358 所，僧尼 12 万多人；武宗时有寺 44600 所，僧尼 36 万人。^①同时武宗灭佛并没有使佛教衰落，反而在禁令解除后，又促成了一次重修寺院的高潮。这时期最为著名的寺院就是被称为“四大丛林”的山东灵岩寺、荆州玉泉寺、天台国清寺、建康栖霞寺，它们也是著名的三论宗和天台宗的发源地。五代时期，北方各国一向对度僧建寺实行限制措施，如后唐、后晋、后周等，因此寺院多被废止。而南方各国的君王多崇佛，因此兴建寺院之风依然盛行。在杭州，寺院就有 480 余所。王溥《五代会要》记载，显德二年（955），全国共有寺院 6030 所，僧尼 6.12 万人。两宋时期，由于政府停止了寺院的废毁，放宽了度僧的名额，导致寺院数量猛增，僧尼大量增多；至真宗时寺院总计有 4 万余所，全国僧尼达到 45 万多人。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 14 称，这时杭州城内外，“唐已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宋代寺院大抵可分为禅、教、律三类。宋宁宗嘉定年间，对江南各寺进行品第，以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以钱塘中天竺寺、温州江心寺、湖州道场寺、金华双林寺、宁波雪窦寺、台州国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灵谷寺、苏州万寿寺、虎丘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温州能仁寺、宁波白莲寺为“教院五山”，以钱塘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湖州慈感寺、宁波宝陀寺、绍

① 参见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

兴湖心寺、苏州大善寺、北寺、松江延庆寺、建康瓦棺寺为“教院十刹”，这些寺院都是当时江南著名的梵宫宝刹。辽代兴建的最有名的寺院就是河北蓟县的独乐寺。元代寺僧依然不减增长趋势，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共有寺院 24318 所，僧尼 21 万多人。寺院多为皇室所修，极尽奢侈宏丽，如大护国仁王寺、大龙翔集庆寺等。明代虽对建寺度僧有明文规定，但是私度僧尼和暗修寺院的现象相当严重，仅四川，据《益部谈资》云：“仙宫佛院，成都颇盛，半创自蜀藩献王时。既累代藩封，又中贵从而增益之。殿宇廓庑，华丽高敞。观如玄天、云台，寺如昭觉、金像、净居、净因、金沙，庙如昭烈，宫如青羊，俱不减两都规模，促供游眺。”从此也可窥见一斑。清代沿袭明制，对寺院僧尼都有限制。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僧尼也在大量增多。据《大清会典》中礼部于康熙六年（1667）的统计，全国共有寺院 79622 所，僧众有约 12 万人。这以后的数目当更大，至清末全国僧尼达到 80 多万人。

藏传佛教的寺院，据不完全统计，到建国为止，全国共有大小喇嘛寺庙 5000 多所，僧侣 40 余万人。著名寺院有拉萨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礼囊的桑耶寺、萨迦的萨迦寺、东达孜的甘丹寺、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西宁的塔尔寺、夏河的拉卜楞寺、承德的外八庙、北京的雍和宫等。

道教宫观的雏型应该是早期五斗道的活动场所——静治。后来出现了地位较高的治所，师家为之，初有二十四治，后增至二十八治，以与二十八宿相应。后又形成四十四治。到了三国，各地治署混乱，没有章法，如《大道家令戒》所言：

“诸职男女官，昔所拜署，今在无几”自从太和五年以来，诸职各各自置，置不由吾气真气，领神选举。或听决气，信内人影梦；或以所奏，或迫不得已，不按旧仪，承信特说；或一治重官，或职治空缺。受职者皆滥对天地气候，理三官文书，事身厚食。”因此规定：“诸职自今以后，不得妄自署置为职也。”在南方，著名道士左慈也曾于茅山洞穴中创建宫室，开山传道。晋宋以来，随着道教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日益扩大，宫观兴建开始盛行。据陈马枢《道学传》和刘大彬《茅山志》的统计，当时著名道馆就有100多所，其中以茅山一带最为集中，如华阳三馆、朱阳馆、清远馆等。此外其他地方亦有道馆，如建康崇虚馆、始宁四明山馆、余姚太平山馆等。北魏时，北方天师道经寇谦之改造而成新天师道，且被政府许可转为官方道教，修造甚众。孝文帝时，王道义率弟子七人到终南山楼观师牛文侯，大兴土木，使楼宇一新。建德四年（574），北周武帝宇文邕严达建通道观于终南田谷，选道士10人，使共弘教传法。其后经隋唐两代诏令大修，并赏赐大量土地、钱财和庄户，使楼观成为北方著名的道教丛林。现在一般认为，道教最早的宫观就是陕西周至的楼观。其次，隋至唐初，著名的道观还有终南山的云居观、华山的云台观以及京城的玄都观等。唐代崇道，因此宫观的兴建极盛。仅开元年间（713—741），全国就有宫观1687所，其中包括550所女冠宫观。^①唐玄宗天宝二年（743），诏令升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各郡为紫极宫。这些宫观华丽壮观，规模非常。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

① 《大唐六典》卷4